

中国
古典小说

ZHONGGUO
GUDIAXIAOSHUO

新论集

段启明
陈周昌 著
沈伯俊

云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

段启明 陈周昌 沈伯俊 著

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重慶

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

段启明 陈周昌 沈伯俊 著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 北碚)
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.875 插页2 字数:216千

1987年11月第一版

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000

•

ISBN 7-5621-0092-6/G·67

统一书号: 7405·55 定价: 2.04元

序 言

王 利 器

段启明、陈周昌、沈伯俊三位同志的《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》即将出版了，这对古典小说研究来说是一件好事。我以欣喜的心情表示祝贺，并为之作序。

启明、周昌、伯俊三位都是学术界的中年骨干，最近几年相当活跃。他们的论著，我零零星星地看到一些，这次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通观收入本书的二十一篇文章，可以肯定的有几点：

之一，论述面较广。从中国小说史上最早的长篇巨著之一《三国演义》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《红楼梦》，从英雄传奇的开山之作《水浒传》到它的续书《水浒后传》，从最优秀的讽刺小说《儒林外史》到多年来不受重视的《镜花缘》，明清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三位同志大都有所论述，这说明他们视野比较开阔。

之二，勇于提出新见解。文学研究和其它任何科学研究一样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，必须不断地开拓新的领域，提出新的见解，启迪人们的智慧。在这方面，三位同志作了积极的探索。启明的两篇论《红楼梦》与中国传统美学观的文章，周昌的《宋江性格结构试探》、《论曹操形象的典型化》、伯俊的《论魏延》、《论〈镜花缘〉对科举制度的批判》等，都写

得有一定水平。拿周昌的《宋江性格结构试探》一文来说，它写于一九八〇年，是国内较早运用性格组合原理分析古典作品人物形象的论文，其中谈到：

要想叩开《水浒传》这座艺术宫殿的正门，探索宋江的形象性格，深入分析性格要素的组合层次，确实是一把有用的钥匙。

这个完整的、而不是患有性格分裂症的艺术典型，是通过六十三个章回，用性格结构的多层次组合而刻划成功的。这种人物性格结构的多重性和复杂性，正是认识和分析宋江形象的关键所在。

这些评论确实使人耳目一新。

之三，注意进行系统研究和比较研究。这种研究，对于开拓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，有着积极的作用，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注意。在这方面，启明的《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人物形象系列美漫议》、伯俊的《〈儒林外史〉与〈镜花缘〉》都是有益的尝试。启明在他的文章中说：

在他们（指古代作家）所创造的人物形象中，其善恶之分，美丑之辨，是十分严格而明确的。那管全的分明，实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主要特征之一。

对于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，我们主要是考察他们的共性；但作为一个系列，我们就不仅要考察他们的共性，而且更要考察他们的发展演变的过程。

总之，作为“系列”是不同于“类型”的，它呈现出明显的发展变化过程，而这种过程往往正是人们的审

美心理变化的反映。

这样的论述，显然比那些单纯罗列现象，就事论事的文章更能给人以启发。

之四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在古典小说研究中，众说纷纭的情况是常有的，对同一个人物形象的看法截然相反者也不少见。为了有利于学术研究和争鸣的逐步深入，伯俊在他的《深入底蕴，实事求是》（载1984年8月7日《光明日报》）一文中提出：

拿古典作品人物形象的研究来说，我认为应该做好这样两项工作：一是根据作品产生时代的历史条件，如实地指出作品的思想内涵，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历史生活依据和作家对各个物形象的爱憎褒贬，分析每个人物形象的性格特色和美学价值。二是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，分析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认识意义及其给予我们的种种启示。……要使二者互相补充，在研究中构成一个整体，前提是要深入作品的底蕴，关键是要实事求是。

对他的这个观点，我是欣赏的。综观三位同志的文章，基本上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不作无根之谈，力求比较恰当地分析作品及其人物。

启明、周昌、伯俊三位都正当盛年，我希望他们再接再厉，为繁荣祖国的学术事业作出新的贡献。

目 录

序言.....	王利器
---------	-----

向往国家统一，歌颂“忠义”英雄

——论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.....	沈伯俊（1）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试论《三国演义》的历史观

——关于“英雄史观”和“正统观念”

的辨析.....	段启明（17）
----------	---------

论曹操形象的典型化.....	陈周昌（31）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论魏延.....	沈伯俊（42）
----------	---------

孙坚孙策论.....	陈周昌（58）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论周瑜.....	段启明（74）
----------	---------

略论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的艺术构思.....	陈周昌（89）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毛宗岗评改《三国演义》的得失.....	陈周昌（105）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从题材、主题和作者意识论《水浒》

写的是农民起义

——与欧阳健等同志商榷.....	沈伯俊（117）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宋江性格结构试探.....	陈周昌（131）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论《水浒》韵文的艺术作用.....	陈周昌（146）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陈忱和他的《水浒后传》.....	陈周昌（161）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试论曹雪芹的文学创作主张.....	段启明(174)
论《红楼梦》生活细节的描写.....	段启明(188)
《红楼梦》与中国传统美学观.....	段启明(207)
再论《红楼梦》与中国传统美学观.....	段启明(218)
鲁迅红学观浅探.....	段启明(236)
《儒林外史》与《镜花缘》.....	沈伯俊(245)
论《镜花缘》对科举制度的批判.....	沈伯俊(260)
论魏秀仁修改《花月痕》的教训.....	陈周昌(276)
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人物形象系列美漫议.....	段启明(290)
后记.....	(307)

向往国家统一，歌颂“忠义”英雄

——论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

沈 伯 俊

打倒“四人帮”以来，特别是一九八三年四月举行的首届《三国演义》学术讨论会以来，沉寂已久的《三国演义》研究日趋活跃，百家争鸣，新见迭出，蔚为大观。其中，关于主题的争论便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。迄今为止，人们对《三国演义》主题的提法已达十二种以上（包括“文革”以前提出的观点）。

于是，从一九八四年起，一些同志对主题研究提出了怀疑和否定：有的认为探讨主题就是“主题先行”，有的认为对主题的讨论毫无意义，有的甚至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。这样一来，凡欲深入研究《三国演义》乃至其他古典小说名著的人，都不能不认真思考——

究竟怎样看待主题研究

在文人学士中，偶尔心血来潮的游戏笔墨之作确实是存在的，完全否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。但是，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，当他呕心沥血地进行创作的时候，都

不可能毫无目的、毫无选择地拼凑素材，驱遣文字，都必定要对他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作出自己的判断，必定要表达某种思想和主张。象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这样凝聚了作家多年乃至毕生精力的伟大作品更是如此，而这些判断、思想和主张又总有一个统摄全局的中心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题思想。南朝刘勰云：“意授于思，言授于意”

（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）；唐代杜牧云：“凡为文以意为主”（《答庄充书》）；明末清初王夫之云：“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，俱以意为主”（《姜斋诗话》）；清代李渔云：

“古人作文一篇，定有一篇之主脑”（《闲情偶寄》）。他们虽然没有用“主题”这个词，但实际上都强调了主题的提纲挈领作用。在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中，领导文艺工作时间最长、与文艺工作者联系最密切、对文艺创作接触最多的周恩来同志曾经明确指出：“作品总有个主题思想，解决个什么问题。”（《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）中外许多著名作家都介绍过自己在创作中提炼主题，表现主题的经验。因此，那种认为主题根本不存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。

有的同志质询道：“思想有哲学、宗教、政治观点、伦理道德观念等各种具体形式，所谓‘主题思想’究竟指的是哪一种具体的思想呢？”我认为，这个问题本身就提得含混不清。诚然，思想有多种具体形式，一部作品也可以反映多方面的思想；但就一部特定的作品而言，居于中心的思想却只有一种。至于哪一种思想居于中心地位，则既要受题材的制约，也要受作者世界观的指导。正因为这样，主题思想是因具体作品而异的，不会千篇一律。同样是莎士比亚的剧作，《仲夏夜之梦》和《威尼斯商人》的主题会是一样吗？《哈

姆雷特》和《奥赛罗》的主题又怎么会雷同？同样是写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，施耐庵、罗贯中的《水浒传》和俞万春的《荡寇志》也决不会有相同的主题。显然，离开了具体的作品来预先规定主题“究竟指的是哪一种具体的思想”，那是谁也无能为力的。

当一部作品定型以后，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，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方面对它进行条分缕析的解剖；而对于不同的研究者来说，无论先从哪一方面着手，都是可以的，并不需要遵循固定的顺序。在《三国演义》研究中，有的同志首先注意到人物形象，当然可以；有的同志首先对它的战争描写产生兴趣，也未尝不可；同样，首先研究它的作者、成书年代、版本源流或者艺术手法、结构特点等等，也都是可以的。既然如此，一些同志首先探讨它的主题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这种探讨同创作中的“主题先行”完全是两码事。

我们之所以重视主题研究，是因为对一部杰出的作品来说，其激动人心，历久不衰的魅力，虽然取决于许多因素，但主要地却是来自它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。就《三国演义》而言，论情节的曲折离奇，它不及后来的公案小说；论对厮杀场面和人物武艺的描写，它也比不上新旧武侠小说。但是，它却经受了漫长的六百年历史的考验，一直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，在文学史上占有比公案小说、武侠小说重要得多的地位。其根本原因，就在于它通过丰富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，表现出博大深厚的思想内容。在这里，主题思想是起了关键作用的。

必须强调指出，我们重视主题研究，只是为了更好地把

握作者的创作意图，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；决不是说主题就是作品的一切，主题研究就可以代替对其他问题的研究，更不是说只要有了好的主题，作品就一定会成功。创作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精神劳动，影响作品成败的因素很多，人物、情节、语言、结构等都很重要。在真正的艺术家笔下，这些要素总是水乳交融的。唐弢同志说得好：“主题需要从题材产生，但又反过来使题材趋于完整；好比灵魂需要依附于肉体，但又反过来指导肉体，使肉体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一样。一篇作品内容丰富，而主题思想不明确，这就好象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；如果主题思想有，读起来却干巴巴，毫无生趣，那又可能变做没有血肉的游魂落魄。两者都要不得。”（《理乱麻》，载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《创作漫谈》）因此，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；对作品必须进行多侧面、多层次的考察，进行综合分析，才能全面地把握它，揭示它成功的奥秘。

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。综观几年来的《三国演义》研究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点：

第一，根据我的粗略统计，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四年底，全国各级报刊发表的《三国演义》研究文章共约三百篇左右，其中专论主题者不过二十篇左右，仅占总数的十五分之一，可见学术界同行们并没有一窝蜂地围绕主题问题兜圈子。

第二，对《三国演义》主题进行过探讨的同志并没有在这一点上止步不前，他们同时又认真地研究了作品的人物形象、艺术特色以及毛评的得失等问题，从而不断地开拓着研究的领域。

第三，目前提出的各种观点，并不是以往各种意见的简单重复，而是在新的基础上所作的更深入的开掘。同时，这些观点并不是彼此对立，互不相容的，而是各有侧重，互相补充的。它们为更加全面、更加准确地概括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提供了基础。

第四，更重要的是，对主题的探讨和争论不仅没有妨碍对整个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，而且激发了更多的人们的研究热情，开拓了人们的思维空间，促使人们注意改进研究的方法，提高思维的缜密性，这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很有好处的。

当然，应该看到，与《红楼梦》研究、《水浒传》研究相比，《三国演义》研究起步较晚，基础较薄，力量也较弱，要想在短时间内对诸如主题这样的重大问题取得一致，实在不大容易。同时，还应该承认，在过去有关主题的探讨中，确实也有不足之处：有的同志对“主题思想”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，从而导致归纳主题的方法不同；有的同志则有偏执一端的倾向。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——

对现有各说的评价

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首先必须确定两个前提：

其一，统一概念。什么是主题？就是“文艺作品通过描绘现实生活和塑造艺术形象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，是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。是文艺家经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、体验、分析、研究，经过对题材的提炼而得出的思想结晶，也是文艺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、评价和理想的表现。”（《辞海·文学分册》第11—12页）简言之，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

的看法和主张。因此，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，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。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如果概念不同，大家在讨论中只能是瞎子摸象，各执一词，或者是南辕北辙，标准不一。过去，不少同志是从自己阅读作品的某种感受，或者说，是从作品的某种客观效果来分析作品的主题的，这种方法未必可靠。道理很清楚：形象大于思想，乃是作品的普遍现象。同一部作品，在不同时代、不同阶级、不同经历、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，往往是大相径庭的。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，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“主题”。否则，问题只会被搞得五花八门，永远也无法得到统一。

其二，既然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乃是作者罗贯中通过作品所表达的观念和主张，那么，归纳主题的依据就应该是学术界公认为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（简称“嘉靖本”），而不是经过毛宗岗评改的《三国演义》（简称“毛本”）。如果依据的本子不同，也难免方枘圆凿，格格不入。

有了上述两个前提，我们在主题研究中所持的标准就比较统一，意见也就比较容易趋于一致了。

现在，让我们来看看几年来有关《三国演义》主题的各种观点吧（参见拙作《〈三国演义〉研究中若干问题讨论综述》，载《文史知识》1984年第7期）。

“歌颂理想英雄”说。这种观点认为，《三国演义》歌颂了“明君”的典型刘备、“贤相”的典型诸葛亮，“对其他仁厚、智勇、忠义之士，也竭力进行了歌颂。这些歌颂，构成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基本内容。”它抓住了《三国演义》

塑造人物的基本原则，因而抓住了其思想内容的主要方面，值得我们充分重视。遗憾的是，学术界对这一观点至今注意不够。同时也要指出，持此观点的同志对它的阐发还欠深入，对《三国演义》艺术地加以再现的从汉末致乱到三国归晋这一情节主线也未涉及，这不能不说是这种观点的明显的不足之处。

“赞美智慧”说。此说论者认为：“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思想应该阐述为：通过三国时期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描写，揭示了正义的力量只有运用智慧才能战胜邪恶的道理。”这种观点抓住了《三国演义》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；但是，这一方面还不能说是全书的主题思想，用这一观点还无法统帅黄巾起义、鞭打督邮、董卓之乱、袁绍磐河战公孙、孙坚跨江击刘表、李傕郭汜犯长安、孙策大战太史慈、关羽千里走单骑、陆逊火烧连营等一系列重要情节，也无法说明曹操灭袁绍、败马超等重要战役的胜利（它们显然不能称为“正义战胜邪恶”），更无法解释蜀汉灭亡，三国归晋的结局。所以，此说有其片面之处。

“天下归一”说。此说认为，《三国演义》“通过汉末致乱、农民起义、诸侯割据、三国鼎立、西晋统一等一系列曲折复杂的历史事件的描绘，表现了汉末至西晋统一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，表现了‘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’，‘治中生乱，乱归于治’的历史辩证法，表现了‘天下归一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”它抓住了《三国演义》的情节主线，揭示了罗贯中通过一系列曲折复杂的历史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向往“天下归一”的思想，因而触及到《演义》主题思想的核心，比较引人注目。它的不足之处是，对于作者在人物塑

造这个重要方面所表现的观点和倾向未能充分注意。因此，用它无法解释：为什么积极进行统一战争的曹操却往往遭到作者的鞭挞？如果让这种观点与“歌颂理想英雄”说互相结合，互相补充，那就比较全面了。

有的同志提出的“分合”说（“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”），其基本内涵与“天下归一”说一致，却不及“天下归一”说准确。这是因为：第一，此说立论的基础是毛本《三国演义》开头的第一句：“话说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，而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却根本没有这句话。第二，《演义》虽然表现了东汉末年由“合”到“分”的过程，但这种“分”并不反映作者的愿望，恰恰相反，作者对这一段“分”的历史是痛心疾首的。作者倾注笔墨重点描写的，倒是由“分”到“合”的过程，也就是“天下归一”的过程。所以，这种观点与其表述为“分合”说，毋宁表述为“天下归一”说。

“讴歌封建贤才”说。此说认为：“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不在于宣扬封建正统思想，也不在于鼓吹‘王道’、‘仁政’，而是要为真正的封建贤才呐喊，歌唱。整部《三国演义》就是一曲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。”它从《三国演义》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这一认识出发，论述颇见新意，能给人以一定的启发。但从本质上看，它与“歌颂理想英雄”说是相通的，却比后者的思想容量更小一些。所以，此说也不足以概括全书的主题。

“悲剧”说。此说论述相当精采，在首届《三国演义》学术讨论会上曾经引起热烈的争鸣。应当承认，罗贯中确实是把曹操和刘备作为一组对立的形象，作为“奸臣”与“仁

君”的典型代表来刻画的，表现了“拥刘贬曹”的思想倾向。但是，把魏胜蜀败视为全书的结局是不准确的，因为蜀亡后仅仅两年，魏就亡于晋，应该说全书结于三家归晋。同时，由蜀亡于魏的史实得出这样的结论：“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，不是正义，而是邪恶；不是道德，而是权诈。……《三国演义》所描写的不仅是蜀汉集团的悲剧，而且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”，这却主要是此说论者的主观感受（尽管这种感受有其深刻之处），而不是罗贯中本人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。罗贯中虽然为蜀汉的灭亡而惋惜，但对率兵灭蜀的魏国大将邓艾却热情地赋诗赞美：

当年邓艾袭西川，
曾把阴平石径穿。
越岭雄兵齐贯索，
临崖大将自披毡。
五丁破路应难及，
三国论功合让先。
汉祚将终须换主，
真饶山向上摩天！

而且在写到邓艾死后，又云：“史官因邓艾盖世之功，乃有庙赞诗一首曰：‘……功成自被害，魂绕汉江云。’”（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卷二十四，《凿山岭邓艾袭川》则及《姜维一计害三贤》则）悼惜之情，溢于言表。这哪里象在描写“邪恶”战胜“正义”的悲剧呢？因此，用“悲剧”说来概括《演义》的主题也是不恰当的。

“仁政”说。此说认为，《三国演义》的“尊刘抑曹”倾向，反映了挣扎在封建制度残酷压迫之下的人民对仁政的